

宋代“三礼”诠释研究

潘 斌◎著



宋儒的“三礼”诠释，包含大量有关哲学思想、礼仪风范、理想人格、政治制度的内容，是宋人社会秩序整合观念的集中体现。探讨宋儒于“三礼”之理解、阐释及应用，对于认识“三礼”在宋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界研究宋代经学、理学等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 民 出 版 社

宋代“三礼”诠释研究

潘 斌◎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方国根 李之美 夏 青 崔秀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潘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01-019917-7

I. ①宋… II. ①潘… III. ①礼仪-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5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0792 号

宋代“三礼”诠释研究

SONGDAI SANLI QUANSHI YANJIU

潘 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6.75

字数:785 千字

ISBN 978-7-01-019917-7 定价:1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三礼’诠释研究”(14CZX031)
西南财经大学专著出版资助项目(JBK1804024)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下，发表了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下中国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礼”乃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乐文化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范式。“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发展和形成的有关祭天、祀祖、区分尊卑上下和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一套仪节制度和行为规范，是人们在相互交际时用来表达伦理思想和感情意识的一种外在形式，当然，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系统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观念，因而它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往往影响、渗透至当时社会的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各个层面中。简言之，“礼”几乎是无所不涵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中国古代社会处处有礼学，研究中国文化处处会遇到礼学。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便教导其弟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① 如果将整个礼学发展史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的话，那么，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周礼》、《仪礼》、《礼记》诸书便是这条文化长河的重要源头。就传统儒家经学而言，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生于齐鲁大地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

^① （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0页。

以礼为尤重。”^①近代礼学名家曹元弼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②“三礼”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来被看作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渊薮，历代礼典的修订，亦无不以“三礼”为基础。“三礼”之学所蕴含的礼学思想，对古代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三礼”学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基础伦理和制度资源的角色。

从内容方面来看，“三礼”诸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遍及先秦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以《仪礼》为例，诚如《礼记·昏义》篇所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③《礼运》篇亦称“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其中记述了先民们冠、昏、饮、食、燕、射、聘、觐、丧、虞等方面的礼节仪式，涉及服饰搭配，礼器陈设，摯币等次，言辞容止，主、相、宾、介、门、阶、面、位、升、降、进、退，揖、让、兴，献、荐、祭、啐，歌、笙、间、合等繁文缛节，仪文节制相当烦琐。凡此之类，都给后人解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周礼》所涉及之内容同样非常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等，可谓无所不包，堪称我国先秦文化史之宝库。至于《礼记》四十九篇，它阐述的思想更是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之意识形态的作用。

我国“三礼”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历代儒家学者的“三礼”学研究相当广泛，传世的“三礼”学论著浩如烟海。据王锴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一书的统计，从汉代到晚清，我国历史上各类“三礼”文献有二千一百一十八种（不含“杂礼书”类），其中《周礼》类文献有五百二十种，《仪礼》类文献有四百九十九种，《礼记》类文献有七百零七种，“三礼总义”类文献有

①（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潘斌编：《皮锡瑞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②（清）曹元弼：《礼经学》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94册，第713页。

③ 本书所引“三礼”原文均出自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如无例外，不再另外出注。

一百九十五种,“通礼”类文献有一百九十七种。此外,著述中关于各方面研究内容也相当丰富,从文字校勘到字词释音训诂,从礼例发凡到礼制考订,从礼文蕴含之礼意阐释到古今礼俗对比,等等,几乎每一诠释领域都有涉及。其间大多属于礼经学的研究范畴,也涉及礼仪学、礼论和泛礼学等方面的问题。

两宋是我国“三礼”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仍据王锬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一书的统计数据,当时各类“三礼”文献有三百三十种,其中《周礼》类文献有一百零四种,《仪礼》类文献有五十五种,《礼记》类文献有一百二十四种,“三礼总义”类文献有二十三种,“通礼”类文献有二十四种,约占历代“三礼”学著述的15.6%。这些统计数据虽然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可以大致反映宋代三百多年间“三礼”研究的基本概况。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今人理应保持应有的尊崇和重视,并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加以探讨、研究和总结。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宋代“三礼”学断代史研究并未受到学界同仁的太多关注和系统研究,除开吴万居的《宋代三礼学研究》一书外,并未见到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同类礼学专门著作。无论在研究深度上,还是在研究广度上,当下对宋代“三礼”诠释状况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这与“礼”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核心内容的地位极不相称。从这一意义上说,潘斌所著《宋代“三礼”诠释研究》一书的学术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就现实意义而言,当下学者进行断代传统礼学的深入挖掘、清理和总结,有助于今人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也有助于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伦理规范、社会秩序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持。潘斌此书,恰好就迎合了这一现实文化重构的需求。

潘斌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2006年至2009年,他曾师从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攻读中国经学史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一直供职于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致力于历代“三礼”学及其他相关专题的研究,著述有《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经学释要》(孔学堂书局2014年)、《皮锡瑞学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可谓学思敏捷,学养深厚,勤于著述。2017年10月,他将这部《宋代三礼诠释研究》书稿寄给我,让我先睹为快,并索序于我。惭愧说来,我自身在“三礼”学研究上素乏创见,只是以整理“三礼”学文献自娱,但考虑到他是我的学术同道,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交谊,于是冒昧地应承下来。细细通读潘斌此书,约略说来,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从章节结构的安排情况来看,潘斌此书善于将专人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融为一体。此书虽然是一部描述宋代“三礼”学史的著作,但在对宋代“三礼”文献的诠释过程中,并不局限于学术史的粗线条式发覆,而是强调通过建立在个案专人专书解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蕴含的全局性问题。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兼顾朝代先后与“三礼”各书、名家个案三方面情况,依次围绕北宋与南宋时期各自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述而成的专书以及几部“三礼”的综论性著作,进行逐一解读;下编则从专题解读的角度,设立五个章节,考察诸如宋儒诠释“三礼”所采用的诠释体式选择,对于三礼文本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认知,“三礼”文本及郑《注》的辨疑,“三礼”诠释与宋儒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三礼”诠释与宋儒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可以说,这种结构安排形式,既有助于发掘不同学者的诠释个性,又有助于彰显宋儒群体的治学共性;既有助于揭示“三礼”文献文本的独特诠释要素与诠释特征,又有助于考察诠释者的治学理念与经世致用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兼顾得较为妥帖。

其次,从研究视角看,潘斌此书善于将学术史与文献史料学、思想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研究结合起来,整体关照和理解宋代的“三礼”学,从而形成立体的、网状的多维度诠释视角。就经学家和专书研究而言,“一个思想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时代思潮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只做某位思想家经学思想的个案研究,还要从宏观上研究经学演变和理学发展的思想背景,只有把具体思想家的经学思想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才能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①,此书上编讨论每一位学者的礼学研究,大体上亦是如此做法。就礼学史的通论性、专题性研究而言,“重要的是把握其历史脉动的规律和社会功能,把握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礼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考察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有一种整体观照的情怀和角度”^②。“三礼”文本极具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随处充溢着关心、反映、参与人生深切的人文关怀。此书第三、四、五章,在考察宋儒的理学思想体系建构以及考察“三礼”诠释与宋儒治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亲力践行时,试图从经史结合、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角度

① 姜广辉:《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 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进行解读，彰显了梁启超“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学术史的治学路径。

再次，从个案的剖析阐释来看，潘斌此书较好地践行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学术史撰写要求。梁先生认为，撰写学术史必须达成这样几个条件：“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①。潘斌此书在上编绍述宋儒“三礼”诠释的名家名著时，很善于从具体名著的诠释话语中解读提炼出宋儒在诠释方式方法、诠释路径、诠释内容、诠释旨趣、诠释功用、文献征引方式、“三礼”文本认知观等各个方面的治学特征。例如，此书在发覆北宋学者王昭禹的《周礼详解》一书时，将其概括为“以文字字形释经”、“引《老》、《庄》释经”、“略语训诂而详于解说”、“法先王”四大特点，便是从诠释内容与诠释方式、文献征引特点、诠释旨趣、诠释风格等角度提炼而来，颇为切合王氏著述的实际和治学特点。

复次，从研究动态的把握来看，潘斌此书亦极具学术史的发展眼光，不局限于就宋代论宋代，而是站在“三礼”学史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此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对于某一礼学名家的治学特点之概括，往往将其和此前学者的注释相对比（包括汉代学者的注释）。如论述宋儒李觏《周礼致太平论》、《礼论》二书的诠释特点时，征引郑众和郑玄的训释实例与李觏解义加以对比分析，借以考察李觏与汉人解经方式的异同。二是对于某一礼学名家之评价，往往发覆该名家对明清时期礼学之影响。如考察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潘斌指出该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礼书的编纂思想和编纂体例、编纂原则上，并枚举元人吴澄《礼记纂言》、清人江永《礼书纲目》及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数书之例加以印证。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佳作，对于当下礼学和经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惠承潘斌不弃，加之却之不恭，于是写下拉杂碎语，愿与学界诸君共享此书。

邓声国

2017年12月28日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页。

目 录

序.....	邓声国 1
绪 论.....	1
一、“三礼”的文本问题	1
二、历代“三礼”诠释之概况	48
三、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59
四、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的现状	64
五、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69

上篇 个案研究

第一章 北宋“三礼”诠释名家名著研究.....	75
第一节 北宋《周礼》诠释名家名著	75
一、李觏的《周礼》诠释	75
二、王安石的《周礼》诠释	90
三、张载的《周礼》诠释	107
四、王昭禹的《周礼》诠释	114
第二节 北宋《礼记》诠释名家名著	120
一、刘敞的《礼记》诠释	120
二、李觏的《礼记》诠释	129
三、王安石的《礼记》诠释	136
四、王安石后学的《礼记》诠释	146

五、张载、吕大临的《礼记》诠释	170
六、二程的《礼记》诠释	196
第三节 北宋“三礼”综论类名家名著	207
一、聂崇义的“三礼”诠释	207
二、陈祥道的“三礼”诠释	216
第二章 南宋“三礼”诠释名家名著研究	228
第一节 南宋《周礼》学名家名著	228
一、易祓的《周礼》诠释	228
二、叶时的《周礼》诠释	235
三、郑伯谦的《周礼》诠释	245
四、朱熹的《周礼》诠释	254
五、王与之的《周礼》诠释	259
第二节 南宋《仪礼》学名家名著	271
一、张淳的《仪礼》诠释	271
二、李如圭的《仪礼》诠释	285
三、朱熹的《仪礼》诠释	298
四、杨复的《仪礼》诠释	315
五、魏了翁的《仪礼》诠释	326
第三节 南宋《礼记》学名家名著	334
一、朱熹的《礼记》诠释	334
二、魏了翁的《礼记》诠释	352
三、卫湜的《礼记》诠释	360
四、黄震的《礼记》诠释	384

下篇 专题研究

第三章 宋儒“三礼”诠释之体式	395
第一节 解体、说体	395
一、解体	395

二、说体	400
第二节 义体、疏体、章句体	404
一、义体	404
二、疏体	408
三、章句体	411
第三节 考辨体、集解体、序体	412
一、考辨体	412
二、集解体	414
三、序体	416
第四节 图解体	417
第五节 宋儒“三礼”诠释体式反映的学风	423
第四章 宋儒于“三礼”之辨疑	426
第一节 宋儒于“三礼”作者和成书之辨疑	427
一、宋儒于《周礼》作者和成书之辨疑	427
二、宋儒于《仪礼》作者和成书之辨疑	453
三、宋儒于《礼记》作者和成书之辨疑	460
第二节 宋儒于“三礼”经文和旧注之辨疑	480
一、宋儒于“三礼”经文之辨疑	480
二、宋儒于“三礼”旧注之辨疑	489
第三节 宋儒于“三礼”辨疑之方法	500
一、以文献为佐证	501
二、以义理审核	504
第五章 “三礼”诠释与宋儒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	510
第一节 《周礼》、《仪礼》诠释与理学体系之建构	511
第二节 《礼记》诠释与辟释老	520
第三节 《礼记·大学》诠释与宋儒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	524
一、《大学》的思想内容及特点	525
二、《大学》与程朱理学体系之建构	527
三、《大学》与湖湘学体系之建构	536

四、《大学》与陆九渊心学体系之建构	541
第四节 《礼记·中庸》与宋代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	545
一、《中庸》的思想内容及特点	545
二、《中庸》与宋代理学本体论之建构	548
三、《中庸》与宋代理学心性论之建构	558
四、《中庸》与宋代道统论之建构	570
第五节 《乐记》与宋代理学思想体系之建构	577
一、《乐记》的思想内容及特点	577
二、张载的“天理人欲之辨”	580
三、二程、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	582
四、胡宏、张栻的“天理人欲之辨”	589
五、陆九渊的“天理人欲之辨”	593
 第六章 宋儒“三礼”诠释与修身齐家	598
第一节 “三礼”诠释与宋儒之修身	599
一、宋儒论《大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599
二、“三礼”诠释与理想人格的构成要素	601
三、“三礼”诠释与成圣之途径	610
第二节 “三礼”诠释与宋儒之齐家	615
一、《书仪》于“三礼”之诠释及应用	616
二、《家礼》于“三礼”之诠释及应用	626
 第七章 宋儒“三礼”诠释与治国理政	634
第一节 “三礼”诠释与宋代教育、人才选拔	634
一、学校建置及教学理念	634
二、贡举之科目及试题	637
第二节 “三礼”诠释与移风易俗	643
第三节 “三礼”诠释与议礼制礼	649
一、关于丧服之讨论	649
二、关于祭礼之讨论	657
三、关于明堂建置之讨论	666

四、其他问题之讨论	670
第四节 “三礼”诠释与议政论政	672
一、“理想国”理论	673
二、治国方略和政策	675
三、据“三礼”提出施政措施	681
四、据“三礼”规劝皇帝	687
结 语	691
参考文献	708
索 引	720
后 记	731

绪 论

一、“三礼”的文本问题

“三礼”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古典文献的统称，属于儒家“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经典一样，“三礼”的文字、篇目、思想等都极其复杂。历代以来，很多学人围绕“三礼”文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周礼》的文本问题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详言班朝治军、设官分职之书。全书共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分别叙述各个系统之职官。其中天官系统共有六十三个职官，其长曰大宰，亦曰冢宰。据《叙官》，可知天官系统之职官属于“治官”，即治国理政之官。地官系统共有七十八个职官，其长曰大司徒。据《叙官》，可知地官系统之职官属于“教官”，即掌教育之官。春官系统共有七十一个职官，其长是大宗伯。据《叙官》，可知春官系统之职官属于“礼官”，即掌吉、凶、军、宾、嘉五礼。夏官系统共有六十九个职官，其长是大司马。据《叙官》，可知夏官系统之职官属于“政官”，即掌九伐之法、征收军赋、制军诘禁等军政。秋官系统共有六十六个职官，其长是大司寇。据《叙官》，可知秋官系统之职官属于“刑官”，即掌刑法之官。《周礼》缺冬官，据《叙官》，可知冬官系统之职官当属“事官”，即掌富国之事。今本《周礼》之冬官部分是《考工记》，共三十工，分为六类，分别是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磨之工、埴埴之工。

1. 《周礼》的发现

《周礼》最开始称《周官》^①。《汉书·礼乐志》曰：“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②《汉书·王莽传》载汉平帝元始四年（4）征天下异能之士，所列书名中有《周官》。其曰：“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③以“周礼”为书名者，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王莽居摄三年（8），莽母功显君死，当时刘歆与博士诸生七十八人议功显君服，就有《周礼》之称谓。其议有云：“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④由此可见，《周官》改名《周礼》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前。改《周官》为《周礼》之原因，如孙诒让所云：“歆盖以《周官》故名与《尚书》混淆，而此经为周公遗典，与士礼同为正经，因采《左氏》之文，以为题署，义实允当。”^⑤

《周礼》被发现，是较晚的事，文献的记载亦有异。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即河间献王所得说、秘府说、孔壁说和孔安国所献说。

一是认为《周礼》是河间献王所得。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

① “周礼”二字，最早见于《左传》。《左传》文公十八年传，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闵公元年传，齐仲孙湫曰：“鲁犹秉周礼。”昭公二年传，晋国韩起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所言“周礼”，皆指周代礼制，而非书名。此外，《史记》有称《周官》者，如其曰：“《周官》曰：‘冬至日，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357页）又曰：“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司马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473页）现存《尚书·周官》无关于封禅之事者，今之《周礼》亦无此所征引之文字。故《史记》所言《周礼》，既非《尚书·周官》，亦非今之《周礼》。

②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038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4069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4091页。

⑤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2页。

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献王者。……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①河间献王究竟何年得书，此并无明言。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若《景十三王传》的记载属实，《周礼》被发现当在前155年至前130年之间。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引“或曰”云：“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②《隋书·经籍志》亦有相似之载：“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③李氏献书之事，两汉史书无记载，故阙疑。

二是认为《周礼》出自秘府。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曰：“《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④马融认为，《周礼》曾因秦始皇焚书而被隐藏于山岩屋壁，直到汉代废挟书之律，《周礼》才见天日，然旋即又被藏入秘府，以至于汉代传礼诸儒亦未得见。

至于《周礼》献王所得本与秘府本之关系，孙诒让做如此推测：“案：贾所引马《传》，盖即《周礼》传序之佚文。……马序所述此经隐显源流，最为综析，当得其实。……《释文序录》载或说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

①（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410页。

②（唐）陆德明著，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卷一《序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③（唐）魏徵：《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经籍一》，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925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5—636页。